

# 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》评述

李晓英

(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兰州 730070)

鲁西奇编著的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》于2014年10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作者运用了“空间”的观念和方法,思考了“空间”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,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。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、核心与边缘、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,分别论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、中国历史发展的5条区域性道路、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、中国历代王朝的“核心区”及其变动、“内地的边缘”、“边缘”的“核心”、空间与权力、城墙内的城市、散村与集村等主题,多角度、多层次回答“多元、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可能的”这一宏大命题,得出了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认识。

(1) 作者摆脱了以社会形态演进及“王朝更替”为中心线索的中国历史叙述与阐释的体系,采取区域多样性的思考方法,把目光从“庙堂之上转移到山野之间,着意于追寻区域或地方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(及其与王朝脉络之间的关联)”(第65页)。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区域性差异,根源于各地区生存环境的差别、生存于其间的各种人群的不同,以及不同人群对其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“适应”与“应对”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方式。在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各种因素也是不尽相同的。作者指出,在中国历史上,存在着中原道路、南方道路、草原道路、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5条基本的区域性历史发展道路,其社会经济形态、国家形态及其形成演变过程、族群与文化特质诸方面均表现出了根本性差别。“多样性”的视角,对于分析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,理解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异与关联,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。

(2) 作者在地理学“核心—边缘”理论的基础上,对“核心区”、“内地的边缘”、“边缘的核心”三个概念做了界定。作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,受到王朝特别重视、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,它可以提供王朝统治所依靠的武力、财赋与人才资源,并拥有统治全国的合法性,此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所依赖的“核心区”。与“核心区”对应的概念是“边缘区”,中华帝国的疆域内的“内地的边缘”,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缘,也是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边缘,是一直存在而“并未真正纳入王朝控制体系或官府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”,是帝国疆域内的“化外之区”(第238页)。作者指出正是这些“内地的边缘”的地理与社会环境,为传统中国的秘密社会(特别是秘密宗教)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密不可少的空间,“合法性”社会体系的边缘,正是可能产生秘密社会的“核心”。上述概念的界定和分析,对传统中国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。

(3) 在中国古代城市与空间形态的分析上,作者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占主导地位、主要立足于西方工业化城市经验的、以功能分析为主线索的传统方法,认为“制度安排、运作及其变迁,城市空间、城墙、标识性建筑或地理事物的象征意义,特别是蕴含的文化权力及其在城市社区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,应当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研究的两个新切入点”(第342页)。作者提出,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,还是一种文化权力,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,是区分华夏与非华夏、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,因此,作者指出“城墙内的城市”不能涵盖中国古代大部分城市的形态特征,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城市与乡村并不是所谓的“城乡连续体”。

总之,虽然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》是从空间及其力量的认识与理解出发,思考“空间(或者说是地理)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,或者可以称为“历史研究中的地理学道路”,但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却又是多方面、多方位的,作者在把时空要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同时,又广泛吸收了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,从而在广泛应用翔实史料考证的基础上,严谨地论述了“广阔中国”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灿烂的多样性特征。